

特稿

施格、宾格及其演化趋势

金立鑫

(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世界语言普遍存在施格型(ergative)与宾格型(accusative)两大配置系统,其分布、对立与演化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本文继承“人类语言总体上存在从施格向宾格方向演化”这一基本假设(与语序从SOV向SVO演变趋势平行),着重探讨驱动这一演化进程并促使论元配置复杂化的三种核心动因:演化遗留、语言接触与语义细化。具体而言,文章首先论证非宾格、中动等结构为通格结构的历史残留;继而分析大规模语言接触如何加速或重塑施格—宾格的配置模式;最后通过语义细化,探讨施格标记与分裂施格现象如何由使因性、意志性、完整体等语义范畴所驱动,从而实现施事与受事更精细的区分。本文提出的框架不仅能解释分裂施格的印地语、巴斯克语等现代施格语言的存在,也为理解汉语等混合配置语言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施格;宾格;分裂施格;语言类型学;演化;语言接触;语义细化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001-19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01

0 引言

语言中三大基础论元施事(agent,简称A)、当事(不及物动词的唯一论元,sole argument of intransitive verbs,简称S)、受事(patient,P)的配置系统(alignment systems)是类型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世界语言中,最常见的两种配置模式是宾格型(accusative alignment)与施格型(ergative alignment)。前者将及物动词的施事A与不及物动词的单一论元S对齐,而后者则将S与及物动词的受事P对齐。

世界语言中这两大论元配置系统也是语言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两大系统之间的结构对立、地理分布与演化问题(Comrie,1978,1981;Dixon,1994)。在地理上,施格系统在世界语言中主要分布在北纬30~40度之外的边缘地区(气候与地理环境条件:极其困苦严峻与雨水丰沛优渥两极)以及小型语言群体中(金立鑫,2022),而大型文明语言在统计学上更倾向于宾格格局(Comrie,1981;Nichols,1992;Dixon,1994)。

作者简介:金立鑫,男,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类型学和语法学研究。

引用格式:金立鑫.施格、宾格及其演化趋势[J].外国语文,2026(4):1-19.



本刊微信公众号

施格系统与宾格系统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可能共存于同一语言内(于秀金等,2025)。例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库尔德语等语言展现出分裂施格(split ergativity)的现象。当然,这种分裂现象通常与体貌、时态、语义角色相关(Anderson,1977; DeLancey,1981; Bossong,1985)。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基础论元配置系统并非绝对或一成不变,它们在宏观趋势与微观变异之间常有流动或一定程度内的混合。

本文在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施格→宾格”是人类语言演化的总体趋势,与语序的SOV→SVO演化方向平行。不存在宾格向施格方向演化的总体趋势,如同不存在SVO语言向SOV语言演化的总体趋势一样(Gell-Mann et al.,2011)。这是我们的工作假设。宾格语言中若存在施格现象,并不能证明存在宾格向施格方向演化的总体趋势^①,也并非论元配置的“返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机制来解释:(1)演化过程中的中间状态与施格配置的遗留;(2)大规模语言接触带来的暂时性逆回流;(3)宾格格局内部的语义精细化。这为解释印地语等分裂施格语和巴斯克语等施格语言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揭示了语言演化过程中方向性与复杂性之间及其内部关系的相互影响。

1 施格语言以及施格向宾格的演化

根据金立鑫(2022)对世界35种施格语言所处地理分布、气候特征以及这些语言母语者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观察发现,这些施格语言主要集中于高原、极地、热带雨林、沙漠等地区,多为与外界隔绝的小型群体(如巴斯克语、高加索语言、因纽特语、瓦尔皮里语),几乎没有L2语言学习者,其语言除了个别语言专业工作者的调查报告之外,未与其他语言有较大规模接触。这些语言绝大部分分布在北纬50度以北极其严寒的地区以及南纬5度以南气候温暖雨水充足条件十分优渥的地区,或气候极其干燥酷热的地区。

人类语言原始形态类似儿童习得语言的早期阶段(在离群聋哑人原始手语中也可以观察到),通常以单论元结构为主。语言习得研究同样表明,人类语言早期阶段普遍以单论元结构为主,且唯一论元多为theme或patient,而非典型施事(Bowerman,1974,1982)。普罗戈瓦茨(Progovac,2015)所说的“类通格”(absolutive-like)就是一个名词加一个动词构成的“N+V”单论元结构。当然,逻辑上也可能存在“V+N”结构形式,但按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规律——可识别度高领先原则(陆丙甫,2005),而“N+V”最有可能。其中的名词可以是任何语义角色,因为只有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唯一出现的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无需区分,所以这个名词不必带任何形式标记,这反映在语言结构中就是最初的类通格结构。

^① 我们不赞同Dixon(1994)的施通格与主宾格循环演变的假设。迄今为止未能发现人类语言有从主宾格彻底演变为施通格的语言,而相反的演变案例不少,参见下文。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语言中所谓的“无标记被动句”(Patient + V)其实就是这种通格结构的遗留。因此可以说,类通格结构最有可能是人类最原始、最基础的句法结构。这种句法结构与当时人类的思维能力、生产能力以及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

但随着原始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深化,随着思维的发展,语言结构从单论元模式发展出双论元模式。也就是从“N+V”发展(或分裂)出“ N_1+N_2+V ”模式。由于N可以是actor、agent、patient等中的任何一个,哪个成分首先从N中分化出来就成为问题。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受凸显施事者功能的驱动,agent从中分化出来,形成 $A+[actor/patient]+V$ 模式,且这种语言以“ $[actor/patient]+V$ ”为最常见的基础结构,若无必要agent不出现。只有当需要凸显施事者(如表示使役、行为的完整性等意义时)施事才出现。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施格模式。

第二种,根据戴蒙德(Diamond, 1997)的欧亚陆轴理论,人类在北纬 $30^{\circ}\sim 40^{\circ}$ 这一适合农耕生产方式的气候地域经过上万年的时间逐渐驯化了谷物[西亚新月沃地两河流域、人类最早的农业发源地(约北纬 $32^{\circ}\sim 35^{\circ}$)驯化小麦、大麦];1.1万年前北纬 $30^{\circ}\sim 40^{\circ}$ 中国黄河流域(驯化粟、黍)、北纬 $25^{\circ}\sim 35^{\circ}$ 长江流域(驯化水稻),从采摘渔猎模式发展为农业模式。随着农业文明的形成,人群的聚集以及商业的形成导致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人类对社会认知的进步,人类开始认识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差别,试图在语言中有意识地区分行为者和被影响的对象,由此人类语言有了第二种从类通格结构中分化出新结构模式的可能:受事patient从类通格中独立出来:“ $[agent/actor]+patient]+V$ ”,这就形成了“ $[A/S]+P]+V$ ”结构模式,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典型的SOV宾格模式,世界语言中最常见基础语序之一的原因。古典拉丁语虽然具有较为自由的语序,但通常被认为具有一定的SOV倾向。

逻辑上的第三种分裂模式几乎不存在,即从 $[A/S/P]$ 中将S分化出来,形成 $S[A/P]$ 模式。我们无法想象一种语言中的施事A能和受事P作为同一个句法成分^①。

因此,迄今为止,人类语言最多的是施格结构模式和宾格结构模式。大致上,施格模式主要分布于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原始的北纬 $30^{\circ}\sim 40^{\circ}$ 之外,北纬 $30^{\circ}\sim 40^{\circ}$ 之间的农耕社会则最早发展出宾格结构模式。由于它们都来自同一种类通格结构,这也是迄今为止很多宾格语言中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施格配置现象的原因。

原始施格语言社群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宾格语言的影响,逐渐发展出宾格模式,从而逐渐形成各种形式上的分裂模式或混合模式也很自然。因此,人类语言句法结构的“施格模式—混合模式—宾格模式”大致对应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的演化方向。类

① Acehnese 语中表面S优先本质上不同于通格的分化(Durie, 1985),参见第4小节中亚齐语的讨论。

比语序演化(SOV → SVO),论元配置系统也存在“施格 → 宾格”的趋势。多数施格语言都以OV语序为基础语序,罕见VO基础语序的施格语言。而多数VO语序语言都是宾格语言^①,即使宾格中混有施格现象。

下面是施格语言演化为宾格语言的证据:

科格希尔(Coghill, 2016)指出阿拉姆语(Aramaic)从施格类型模式演变为宾格模式:

早期阿拉姆语的施格配置:

(1) šəkəl-āh l-aynēh

take. PFV-3MS ERG:3MS-to eyes. his

[他取走了他的眼睛(他弄瞎了他)](及物结构,施格标记,通格无标记)

(2) napal al qirya

fall. PFV on city

[(城)倒塌了](不及物结构,通格无标记)

新阿拉姆语中施格标记消失(宾格化)(Coghill, 2016:201):

(3) qaəl-le

kill. PFV-3MS

(他杀了他)(无施格标记, A 零标记)

(4) gawre bēšle

man. M. SG cook. PFV. 3SG

[男人煮了(某物)](一致标记随主语,无施格标记)

(5) yaldə qəm-le

child. SG rise. PFV-3SG

(孩子站起来了)[S=主格(非通格形态),宾格化完成]

类似的由施格向宾格语言演化的案例还有奥塞梯语(Belyaev, 2010)、库尔德语(Jügel, 2009)、基兰特语(Kiranti)^②支中的图隆莱语(Thulung Rai)(Lahaussais, 2003),而相反演化方向的案例未能发现。虽然也有个别路径可以产生宾格衍生出部分施格的变化,但真正全系统的论元配置翻转的例子几乎从未在文献中得到明确证明。去施格化(Dergativization)并宾格化远比宾格语言中新生施格系统更常见,更多的是施格系统在特定语境下逐步宾格化。目前学界尚无被普遍接受、证据完整、结构层面彻底的纯宾格演变为纯施格的个案。下文讨论宾格基础上出现部分施格的现象。

① 以上结论参见WALS-Chapter 81(Dryer)和Chapter 98(Comrie)。

② 处于喜马拉雅南坡带,北纬26°~28.5°之间。

2 宾格语言中最常见的施格现象

2.1 非宾格和非作格^①现象

前面我们介绍过,主宾格的典型配置是“[A/S]+P+V”,根据这一论元配置模式,下面英语和汉语中的例子很容易按传统语法的分析得到解释:

(6) a. John broke the vase. b. 张三打碎了花瓶。

(7) a. He is very upset. b. 他很伤心。

上面例(6)是及物结构,a中的 John 和 b 中的“张三”是施事 A,例(7)是不及物结构,例(7)a 中的 He 和 b 中的“他”都是不及物结构的唯一论元 S。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及物动词的施事 A(John 和“张三”)和不及物动词的唯一论元 S(He 和“他”)都通过在动词前的句法位置来表现其句法身份,这就是所谓的 A 与 S 对齐,我们也可以叫“相同句法配置”^②。按传统语法分析,它们都是句法主语。全世界的英语和汉语语法书都这么统一分析。

再来看宾语,例(6)a 中的 vase, b 中的“花瓶”按传统语法的句法位置分析,它们都是宾语,英语和汉语的名词都没有主宾格形态标记,它们在句子中都按句法分布这种“形态”来表现其句法功能。

但是下面的例子难以做同样的宾格分析:

(8) a. The vase broke. b. 花瓶碎了。

按经典语法理论,例(8)a 的 vase 和 b 的“花瓶”都是动词 break 和“碎”的直接内论元(internal argument)或者是动词语义域内部直接选择的论元(典型的是受事(patient 或者 theme),它们决定了动词的语义投射^③,它们表示承受动作影响或发生状态变化的主体。按珀尔穆特(Perlmutter, 1978)的理论,它们都应该在底层动词短语 VP 的宾语位置。而实际上它们却又不是句子的宾语,而是句子的主语。珀尔穆特(Perlmutter, 1978)将其称为“非宾格”(unaccusative),也就是说它们虽然是内论元,但不是宾格,动词也不是宾格动词而是非宾格动词。问题来了:

英语和汉语中为什么允许例(8)中的 vase 和“花瓶”作为句法主语?除了语用上它们都需要作为话题语的动因之外(要作为话题也可以通过被动化操作来实现),为何句法上允许一个内论元可以出现在主语位置上?我们这就不得不回到前面讨论过的“类通格分化”路径的问题上来。按前面的假设,在类通格结构[A/S/P]的基础上分化出宾格配置模

① 本文以下将“作格”称作“施格”,因为“施格”一望而知,就是“施事格”,比“作格”更便于理解。因此,其他中文文献中的“非作格”在本文中均为“非施格”。

② 语序和分布也是一种形态,或曰“广义形态”。

③ 举个例子,一个动词可能有若干语义,如汉语中的“打”,有多个语义,确定某一特定“打”的意义的是它的内论元,如“打电话”“打球”,内论元“电话”和“球”决定了“打”的意义。能决定动词意义的论元是内论元,或者说是动词语义域内部的论元。

式,操作过程是P从类通格范畴中分化出来,即:[A/S]-P。于是操作的必然结果就是除了受事P论元外,其他所有论元都留在[A/S]这一“主格”大类中,其中包括既非典型的P但又不是典型外论元A和S的“非典型内论元”。这些被遗留下来的非典型P/S,不得不按“主语”处理。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英语和汉语中,同样在其他很多宾格语言中也普遍存在^①,如:

(9)意大利语: La finestra si è rotta^②. (窗子破了)

(10)西班牙语: La puerta se abrió. (门开了)

(11)荷兰语: De deur ging open. (门开了)

(12)法语: La porte s'est ouverte. (门开了)

(13)德语: Die Vase zerbrach. (花瓶碎了)

(14)俄语: Stakan razbilsja. (杯子碎了)

(15)希腊语: To potíri éspase. (杯子碎了)

(16)日语: Kōhī ga koboreta. (咖啡洒了)

以上例句的主语均为具有主题或非典型受事语义的内论元(theme),但不是被动句。如果我们从“通格”视角来看它们,就觉得这非常自然。因为这本就是人类语言最初期的、基础结构中的一类。它们原本都是最原始的“N+V”这一结构中的成员,或者施格结构A-[S/P]中除了A之外的所有论元,其中包括各种非典型P/S成员,而所有这些成员在施格语言中都是通格。

但如果从宾格配置的角度出发,如珀尔穆特(Perlmutter, 1978)的假设,句法上因为非宾格动词没有外论元,造成主语位置的空缺,因此需要把VP内部的非宾格论元移动到主语位置(Spec-TP),以满足句法要求。所以这才有了非宾格结构。但在我们看来,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论元移动的问题,因为所谓的非宾格论元原本就处在所谓的“主语”位置上([S/P]+V)。以上例句若用汉语表达,几乎所有唯一论元都可以直接作“主语”,且语感上相当自然(如上例括号中的中文翻译)。因为汉语底层就有“通格”的配置。

在形式语法中,与非宾格相对的另一种结构是非施格(unergative)结构,实际上就是常见的行为主体作为外论元的不及物结构。如下例:

(17)意大利语: Gianni ha lavorato. (Gianni工作了)

① 所举的罗曼语与日耳曼语例句,并非意在论证它们在句法层面必然由及物句派生,而是说明在这些典型宾格语言中,同一语义类型(非典型受事充当主语的句子)仍然存在。虽然部分语言(如法语 ouverte、德语 zerbrach)在形态上已转化为派生或形容词结构,但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构式依然延续了施格系统中S=P对齐的基本分布模式,只是语法化层级不同。因此,本文的论点不依赖于具体的“词汇派生与句法升格”分析,而在于揭示论元对齐的演化方向与通格残余机制。

② 虽然意大利语中的 si 是反身标记、法语中的 ouverte 是过去分词、德语 zerbrach 中的 zer-是派生前缀,但这并不影响整个结构具有类似通格的性质(P=S)。

- (18) 法语: Jean a couru. (Jean 跑了)
 (19) 荷兰语: Jan heeft gelachen. (Jan 笑了)
 (20) 德语: Hans hat gelacht. (Hans 笑了)
 (21) 西班牙语: Juan trabajó. (Juan 工作了)
 (22) 瑞典语: Barnen skrattade. (孩子们笑了)
 (23) 希腊语: Τα παιδιά γέλασαν. (孩子们笑了)
 (24) 葡萄牙语: Ele correu. (他跑了)

以上所有的“非施格”结构中的论元都是最典型的不及物结构中的行为者充当结构主语的案例。它们与非宾格结构的区别是非施格论元具有行为主动性,行为可控性,而非宾格论元不具有。

然而,非宾格和非施格并非截然对立,二者间或许就是一个连续统,如索拉切(Sorace, 2000: 863-870)提出“助动词选择等级”(Auxiliary Selection Hierarchy, ASH)。表达状态和空间改变(Change of State or Change of Location)的非宾格倾向使用 BE 助动词^①:

- (25) 意大利语: La finestra si è rotta. (窗子破了)(è = BE)
 (26) 意大利语: Gianni è arrivato. (Gianni 到了)(è = BE)
 (27) 法语: La porte est tombée. (门倒了)(est = BE)
 (28) 法语: Jean est parti. (Jean 离开了)(Est = BE)
 (29) 德语: Die Vase ist zerbrochen. (花瓶碎了)(ist = BE)
 (30) 德语: Hans ist gegangen. (Hans 走了)(ist = BE)

而表示具有控制性的行为(Controlled Agentive Activity)则强烈倾向使用 HAVE 助动词,如:

- (31) 意大利语: Gianni ha lavorato. (Gianni 工作了)(ha = HAVE)
 (32) 法语: Jean a chanté. (Jean 唱歌了)(a = HAVE)
 (33) 德语: Hans hat gelacht. (Hans 笑了)(hat = HAVE)

但是表示状态或存在的动词(如 exist, stay, remain),会表现出双重性,位于连续统的中间区域。如:

- (34) 意大利语: Gianni è vissuto fino a 90 anni. (Gianni 活到了 90 岁)(è = BE)
 (35) 意大利语: Gianni ha vissuto a Roma per dieci anni. (Gianni 在罗马生活了十年)(ha = HAVE)
 (36) 法语: Jean est resté à la maison. (Jean 留在家里)(est = BE)

① 助动词或系词+过去分词/分词形容词。

(37) 法语: L' affaire a continué. (事情在继续) (a = HAVE)

(38) 德语: Hans ist geblieben. (Hans 留下来了) (ist = BE)

(39) 德语: Die Firma hat weiterbestanden. (这家公司继续存在下来) (hat = HAVE)

2.2 中动结构^①

宾格语言中普遍存在一种受事论元 P 充当句子主语, 而句子既不是主动句也不是被动句的句法结构叫“中动句”(middle voice)。它最早在古希腊语中归入“中动语态”。主要指论元既参与又受影响的事件(如 louomai“我给自己洗澡”), 可以是及物结构。现代语言学中的“中动句”主要用来指受事做主语且为非被动形式的句子。珀尔穆特(Perlmutter, 1978)提出“非宾格假说”时涉及英语不及物和中动句的相似性。凯泽等(Keyser et al., 1984)较早地在生成语法框架下系统讨论了英语中动句(middle construction), 他研究了英语中的中动句如何派生以及与非宾格句、被动句的关系。凯默(Kemmer, 1993)则从跨语言角度研究了中动现象, 发现中动结构广泛存在于世界语言。其在类型学中被定位为“受事凸显、施事弱化或消隐的结构形式”, 如下面的例子:

(40) 英语: These vases sell well. (这些花瓶卖得很好)

(41) 德语: Dieses Buch verkauft sich gut. (这本书卖得很好) (Buch 是受事)

(42) 法语: Ce livre se vend bien. (这本书卖得很好) (livre 是受事)

(43) 荷兰语: Dit boek leest makkelijk. (这本书很容易读) (boek 是受事)

(44) 西班牙语: Estos libros se leen fácilmente. (这些书很容易读) (Estos libros 是受事)

(45) 葡萄牙语: Este carro vende-se bem. (这辆车很好卖) (Este carro 是受事)

(46) 希腊语: Το βιβλίο διαβάζεται εύκολα. (To vivlio diavázete efkola. 这本书很好读) (Το βιβλίο 是受事)

(47) 俄语: Эта книга хорошо читается. (Éta kniga xorošo čitaetsja. 这本书很好读) (Эта книга 是受事)

(48) 瑞典语: Boken säljer bra. (这本书很好卖) (Boken 是受事)

以上例句均为受事充当句子的主语, 而在典型宾格模式中它们理应为宾格, 句法上处理为宾语才符合宾格配置规则。受事名词若要作为句子的主语则应该作被动化操作才合乎宾格框架的逻辑。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例子中的施事均未出现, 也就是说施事被弱化或索性消失。以上例句用汉语表达也非常自然(如上例中文译文), 因为它们在结构底层就是典型的通格结构。若从功能驱动上来解释, 由于受事有充当话题且弱化施事的表达需求才造成了中动句的构成, 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何中动结构被宾格语言允准。

① 语态与结构以及论元配置虽然属于不同层次, 但这不妨碍我们研究其内部论元角色的配置关系。

3 非施格、非宾格和中动结构的统一解释

现在我们将非施格、非宾格、中动结构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观察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结构的唯一论元在“主动-被动”范畴程度上形成一个三级的连续统:

非施格:actor → 非宾格:theme → 中动:patient
有主动性 既不主动也不被动 有被动性

这三类结构有两个共同特征:(1)都是一元不及物结构;(2)论元都具有话题性(强烈倾向于占据动词前(主语)位置)。这两个特征与施格语言中的通格特征完全一致。所谓的非施格结构的论元就是 S,所谓中动结构的论元就是 P,S 和 P 在施格语言中都是通格。无论是具有施事语义的 S,还是具有 theme/patient 语义的非宾格 S,在施格语言中都按通格编码。请看例句:

A. 巴斯克语(Basque)(Sturua,1985:151-155)

(49) Actor(非施格):Gizona $\emptyset$ etorri da. (男人来了)[gizona = ABS(通格)]

(50) Theme(非宾格):Bere lorategiko loreak $\emptyset$ ihartu dira. (他/她花园里的花枯萎了)(loreak = ABS)

(51) Patient(中动):Perretxikoen liburuak $\emptyset$ ondo saltzen dira. (关于蘑菇的书很好卖)(liburuak = ABS)(Euskaltzaindia,2019)

巴斯克语中这三个不同的语义角色若在宾格语言中分别为非施格、非宾格和中动结构,但巴斯克语全部用零形式标记为通格。下面的施格语言基本如此:

B. 迪尔巴尔语(Dyirbal)(Dixon,1972)

(52) Actor:ɲuma- $\emptyset$ banaga-nyu. (father-ABS return-NONFUT)

(53) Patient:Yabu-ɲgu ɲuma- $\emptyset$ bura-n. (mother-ERG father-ABS see-NONFUT)

C. 格陵兰语(Kalaallisut, West Greenlandic)(Kahn et al.,2022)

(54) Actor:Nuka- $\emptyset$ tuttumik neri-v-u-q. (Nuka-ABS reindeer-INS eat-[-tr]-3SG)

(55) Patient:Nuka-p tuttu- $\emptyset$ neri-v-a-a. (Nuka-ERG reindeer-ABS eat-[+tr]-3SG>3SG)

在前面(40)~(48)例句中,那些语言句法上要求“主语”显性表达,多数为非 pro-drop 语言(如英、德、法语)通常要求显性主语,这一点似乎迫使其句法位置出现 S/P 对齐现象,类似施格语言的通格结构。少数由屈折形态驱动的 pro-drop 语言(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主语可以为零形式。但作为由话题/篇章驱动的零主语(topic-drop)的汉语主语可以空缺,如:()上课了、()吃饭了、()开会了……不仅允许主语零形式,其动词的唯一论元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如:下雨了、出太阳了……也是另一种 S/P 对齐形式(S

在动词后,与P相似)。

(40)~(48)的例子也说明,宾格语言中的“非施格、非宾格、中动结构”在施格语言中与(49)~(55)并无差异,因此都可以看作是原始通格的遗留。并且这种通格句型在汉语中按原有的语序表达相当自然,无需任何句法操作。

因此,我们可以将宾格语言中的非施格结构、非宾格结构和中动句都解释为:宾格语言中受“不及物论元充任话题”的功能需要而保留的一部分通格结构(类通格本身就是最早的话题)。因此,本质上它们都是宾格语言中残留的通格配置。

以上我们对非宾格和中动结构的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数宾格语言或多或少具有施格性(ergativity)的问题(例如汉语中保留的很多P=S的通格现象)。至于为什么施格语言中或多或少有宾格性(诸如Dyirbal语的名词为施—通格而代词为主—宾格等),我们假设,这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与语言结构演变平行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人类现代文明在区域上的传播,施格类型的语言最终将演变为宾格语言。下面我们讨论宾格语言中的施格现象。

4 宾格语言中施格现象产生的驱动因素

人类语言或多或少存在施格和宾格的混合现象,除了我们前文讨论的历史演化进程中的遗留或中间状态,还有一些底层为宾格配置的语言,但却明显具有施格标记的现象。对此,本文提出“‘语言区域接触—语义表达细化’为主导”的分裂施格形成机制的假设来解释。

例如,印度—雅利安语等诸多语言的施/宾格分裂的动因并非单一来源。一方面,语言联盟中的长期接触提供了“在完整体语义域中对施事的显性标记化、动词对受事一致”的结构模式推动施格化在完整体语义域上的扩散,如伊朗语支^①、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的影响;另一方面,宾格系统内部出于语义表达的精细化需求(像似性原则),对高施事性、高控制度、高使因性的施事加以显性标记,从而在原有“主格/主语”的范畴内部派生出“主格—施格—宾格”的三分格局。换一个表述:语言接触提供形态/分布的“模板”,语义细化表达需求提供系统内部的“动因与选择机制”。

以上两种机制并行不悖:接触提供外在的“模板”,语义细化提供内在的“动因与选择”,二者共同塑造了类似印地语、尼泊尔语与马拉地语这类在完整体上优先的施/宾格分裂。由此也解释了“中动—非宾格—非施格”的连续统与通格残余的关系。受区域趋同和

① 其中包括:波斯语(Persian / Farsi)、库尔德语(Kurdish)、普什图语(Pashto)、俾路支语(Balochi)、奥塞梯语(Ossetic)、塔吉克语(Tajik)、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阿维斯陀语(Avestan)等语言。

语义表达精细化共同作用的驱动,语言可能对“主格/主语”进行分化,从中区分出(或凸显)施事者,从而分裂出三种基础语法成分:施格、主格、宾格。逻辑上也可能存在主格、通格、宾格三分格局(如汉语,参见作者系列论文)。下面我们具体观察并讨论这一问题。

4.1 语言接触因素导致的分化

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A. 印地/乌尔都语(Hindi-Urdu)

印地/乌尔都语长期以来都是主宾格语言,但它在与南亚语言(达罗毗荼、伊朗语)的接触中因体貌表达需求触发产生了施格标记-ne,以凸显施事者和事件的完整性。如例句:

(56) a. raam = ne patthar = ko / patthar- $\emptyset$ toD-aa

Raam = ERG stone = ACC / stone-NOM break-PFV. SG. M

(Raam broke the / a stone)

b. raam = $\emptyset$ patthar = ko / patthar- $\emptyset$ toD-taa hae

Raam = NOM stone = ACC / stone-NOM break-IPFV. SG. M be. PRS. 3SG

(Raam breaks the / a stone)

(de Hoop & Narasimhan 2008: 64;更多详细例句和分析参见 Mohanan, 1994)

同样一个事件,例(56) a 表达的是完整事件,说话人用了施格(人)、宾格(石头,定指),当“石头”为不定指时还可以用主格。而例(56) b 表达的是非完整事件用主宾格。这符合(郭锐等, 2025)提出的施事性等级理论(我们概括施事性等级为:施格—主格—通格—宾格)。

根据海格(Haig, 2008)和麦格雷戈(McGregor, 1972)的研究,印地语语法中的施格标记是一个受语言接触影响而产生的区域现象,受伊朗语“施事+动词与受事一致”模式的影响,并且也受达罗毗荼语的影响形成“完整体—施事格标记—受事一致”的论元配置模式。

B. 尼泊尔语(Nepali)

尼泊尔语作为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的语言,总体上属于主宾格语言,其核心句法结构遵循主宾格系统,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有相同的标记,特定的有生、定指或突显宾语可由后置词/格标记-lai 标记。

(57) Rām-le kitāb padhyo. (拉姆读了书)(Noonan, 2005)

例(57)中的-le 为施格标记,其出现的条件与印地/乌尔都语类似:完整事件,凸显施事者的使役性、主动性、及物性与事件的完整性。如果在非完整体(如现在时或将来时)中,尼泊尔语会回归主宾格系统模式。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印地语/马拉地语中,这种现象也可能受藏语的影响(标准藏语、拉达克语是典型的施格语言),尤其是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些藏缅语系语言(如谢尔巴语、塔芒语),也可能是区域趋同(areal convergence)因素的

作用。

尼泊尔语(印欧语系)与藏缅语系语言(如谢尔巴语、塔芒语、尼瓦尔语)长期共存,尤其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北部,藏缅语系语言的使用者与尼泊尔语使用者有密切的语言接触。这种接触可能通过语言借用或句法影响对尼泊尔语产生影响。南亚地区的印欧语系语言(如尼泊尔语、印地语)在历史上与藏缅语系、达罗毗荼语系等语言长期接触,而这些语系中施格配置较为常见。这也可以看作南亚语言的区域性特征(areal features)。

C. 马拉地语(Marathi)

马拉地语与梵语同属印度—雅利安语支,现代马拉地语经中古印度—雅利安阶段发展而来。现代马拉地语是一种典型的同时具有宾格和施格两种配置模式的语言,也是非完整体采用宾格模式,完整体采用施格模式,施事用-nə 或-ni 标记(源自古老的工具格/伴随格)。不及物结构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结构的受事 P 采用无标记的直接格形式。谓语动词通常与通格在人称、数、性等方面保持一致。请看下面的例子:

(58) tumi-nə pal-l-ya kəun bə batla

you. PL-ERG drop-PFV-3PL why DM bottle. OBL. PL

(Why did you drop the bottles?)

(Pandharipande, 2010)

4.2 语义细化导致的论元分化

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部分造成施/宾格分裂语的驱动因素属于地理区域趋同、语言接触等因素,并且这也同时满足了语义细化的需求(像似性原则驱动),那么下面的语言则主要“以宾格为底”。在几乎不依赖强接触的条件下(语言接触为非必要条件),主要由语义细化表达需求(意志性、控制度、致使性、完成性等)的推动,从自身内部演化出了“施/通格”形式。下面是学界普遍认为来自非施格谱系的语言: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闪米特语支的阿拉姆语、南岛语的一支中自身演化出的施格现象:

A. 普什图语(Pashto)、库尔德语(Kurdî)

这是伊朗语支(印欧语系)中主要用于过去/完整体的“内生施格化”语言,这些语言底层属于原始印欧语,是经典的主宾格型。但这些语言在过去/完整体里出现了 A=斜格/施格、动词与 P/S 一致的时态分裂施格,而非过去时/非完整体则保持主宾格配置,如下表所示(Haig, 2008):

表1 普什图语与库尔德语的分裂配置

ACCUSATIVE ALIGNMENT:	A = Dir.	O = Obl.	Verb agrees with A
ERGATIVE ALIGNMENT:	A = Obl.	O = Dir.	Verb agrees with O

也就是说在这些语言中,宾格配置的施事(主语)用直接格,受事(宾语)用斜格;而施格配置,施事用斜格标记,受事用直接格;且宾格配置与动词保持一致关系的是施事(主

语),而施格配置与动词保持一致关系的是受事(通格)^①。这种句法配置在很多分裂语中常见。如下普什图语中的例子:

- (59) wəxwɾa / wəxwɾəla (吃.PST) | dɒdɒi [食物(直接格)] | saɾí [男人(斜格)]
(男人把食物吃了)

例子中的施事用斜格形态,谓语动词与通格保持一致(这是宾格语言中分裂出施格范畴的现象)。相似的句法模式还有库尔德语,其及物结构的过去时完整体显示“施格(斜格标记^②)、动词与受事一致”的模式,如(Thackston, 2006):

- (60) Min tu diti.
1SG. OBL 2SG see. PST
(我看见了你)

例子(60)中的施事(min)以斜格(oblique)形式出现,动词在过去及物范畴与受事一致(2SG),构成典型的施格式指称一致(Thackston 2006)。

这类语言的内部演化机制或许为古/中古伊朗语分词完成式:“由X完成”的被动/体验式结构重新分析为“X=施格”,从而在过去时/完整体范畴中分裂出施格;属于体貌—论元重配的语法化链,这种语法化现象与语言接触几乎无关。不过也有历史语言学家推测所有伊朗语言可能都曾一度是施格语言(Пирейко, 1968)^③,只是每种语言都以不同的速度丧失了施格标记;现在只有普什图语、俾路支语(Balochi)和库尔德语保留了施格标记。如果这样,那么伊朗语中的这些现象就要看作是历史演化的遗迹。

B. 阿拉姆语(Aramaic, 闪米特语支)

这或许也是从宾格底层出发的周期性“起落式施格”。闪米特传统上是主宾格语言。但其中的某些新阿拉姆语在过去/完成范畴内出现施格(也用斜格标记)、动词与P/S一致的分裂施格;后期又有弱化。和伊朗语类似,阿拉姆语在完成/结果的述谓(分词+系词)形式上重新分析出“斜格施事”,在体貌范畴上(完整性/有界性)的作用下形成时态分裂施格,经历了“兴起—扩展—弱化”的历时循环。科格希尔(Coghill, 2016)讨论了阿拉姆语三千年来施格的兴衰循环,证明无需强接触也可由语义(如体貌范畴)细化驱动产生系统性论元配置的更替。这是一条“从宾格出发→内生施格化→再回收”的案例链,支持本文“语义细化可自发产生施格配置”的假说。

C. 亚齐语(Acehnese, 南岛语, 印尼苏门答腊)

①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主宾格语言中主格有标记蕴含宾格有标记,但有一致关系的一般是主格;施格语言中,通格有标记蕴含施格有标记,但与动词有一致关系的一般是通格。陆丙甫老师用常用性解释,其实也可以用底层性解释。通格和主格更为底层,原始状态下就是无标记的。宾格和施格是从类通格中分化出来的,所以要带标记。

② 施事用斜格标记也反映了该标记是后来才加在施事上而非原生的,否则应该直接标施事。

③ Vaillant(1936)推测原始印欧语也是施格语言。

亚齐语作为一种主宾格与施通格混合型的语言(Stokhof, 1988),其句法有明显的 S=P 倾向,与汉语类似,由信息结构/语义选择驱动产生,话题语无论是行为者还是受事者均放在动词前 Theme 的句法位置,由此构成一种句法配置:不及物结构的 S 与及物结构的 P 对齐:S=P,表现出“通格”配置^①,与汉语普通话类似(但汉语的“通格”主要是汉藏语系内部特征),如例(61~63)(Durie, 1985):

(61) gopnyan geu-phajöh lôn

3SG 3. ACTR-hit 1SG

(他/她打了我)(及物)

(62) geu-jak gopnyan

3. ACTR-go 3SG

(他/她走了)(不及物)

(63) Poh nyan patah.

tree that break

(那棵树折断了)(不及物)

亚齐语与汉语这两种语言之间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亚齐语所在区域的标准印尼/马来语是主宾格配置。杜里(Durie, 1985)将其分析为由动词语态—论元—信息结构制约的内部机制。亚齐语也应该是一种在非接触条件下滋生出具有通格现象的语言。它表明即便无强接触,语言也可能因语义—语用/信息结构的精细化表达需求,内生出 S 与 P 对齐的语法现象。

4.3 语义细化动因的进一步证明

前述伊朗语支、阿拉姆语及亚齐语等案例已经显示:语义—体貌因素在弱接触环境下即可独立推动施格标记的出现或重组。然而,更具说明力的是那些地理上相对孤立、几乎无施格语言深度接触、具备清晰历时线索的语言,它们呈现出一种“语义细化—内部重分析”主导的演化机制。以下现象比较典型。

波利尼西亚语(Polynesian languages)的尼乌埃语(Niuean)与汤加语(Tongan)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内生证据。原始波利尼西亚语通常被重建为以 VSO 结构语序为主要语法形态手段、未发展出形态施格的语言(Chung, 1978),其格系统的形态化程度极低,为后续内部重新分析预留了空间。但在尼乌埃语中,原本用于标记被动施事的前置标记 e 被重新分析为标记及物主语(A)的施格标记,而不及物 S 与及物 P 均保持零标记,从而形成典型的形态施格配置(Seiter, 1980; Massam, 2002)。这一变化不一定依赖外来模式,更可能是源于语言内部对高施事性、事件有界性及意志性的语义凸显需求:带 e 的结构倾向于表达高及物

^① 亚齐语的不及物动词在语义上区分 Actor-S 与 Undergoer-S,两者与及物 A/P 形成四分系统(Durie, 1985: 206 ff.)

性和施事责任者。这种偏向属于功能分布层面的语义强化,而非严格意义的体貌分裂模式。重要的是,整个波利尼西亚区域缺乏可证实的来自外部施格语言的结构输入,因此普遍被视为一种在非施格祖语上通过语义—体貌细化自发生成施格标记的内部机制。

玛雅语系的尤卡坦玛雅语及乔尔支(Ch'olan)语言群体现了另一种类型:祖语本身即为严格的施通格系统,而分裂施格则在后期通过体貌语义的再分配在内部产生。布里克(Bricker, 1981)清晰展示:尤卡坦玛雅语在完成体语义域保留较古老的施通格对立,而在非完成体区则出现趋向宾格化的现象;劳等(Law et al., 2006)进一步指出,共同乔尔蒂安(Common Ch'olan)的祖语格系统同样是无分裂施格型语言(straight ergative),现代乔尔支语言的体貌分裂施格则源于后起的结构重组,而非来自外部施格语言的输入。换言之,这类玛雅语言并非“从宾格长出施格”,而是在原有施格系统内部,由完成体的高施事性、致使性及事件界定性所驱动,对格功能进行语义域的重新划分。这一方向与尼乌埃语相反,但机制同样是语义—体貌的内部调节。

西尼罗特语支的帕里语(Pari, ISO 639-3: lkr)^①是一种宾格语言,但也展示了语义—体貌驱动的演化路径。帕里语在特定句式(尤其是完成体及物句)中以后置词 *óbá* 专门标记 A,而 S 与 P 均为零标记,形成接近施格的格局(Andersen 1988)。其周边语言几乎无施格系统,因此该创新普遍被解释为在既有宾格背景下,通过完成体语义域内部的结构重组而形成的 A 标记。现有资料表明,该施事标记的出现不需诉诸语言接触,而可由体貌语义与及物性增强的内部机制解释。

综观上述案例,它们的共同特点并非均来自同一种格类型的祖语,而在于:(1)均处于弱接触或缺乏外来施格模板的环境中;(2)均呈现明确的体貌—语义驱动机制(高施事性、致使性、事件有界性、完成体);(3)施格标记的出现或重组均可用内部语法化与语义域再分配来解释。

因而,这些相对隔离语言社群的资料共同说明“语义—体貌”等范畴的细化可能是格系统演化的动因。它不仅能在原本无施格的系统中生成施格标记(再次强调,这种局部现象并不意味着语言整体上可以从宾格模式演化为施格模式),也能在原本施格的系统中重塑其条件性分布,从而在宏观“施格→宾格”的长期趋势中形成混合模式。此机制应与演化遗留、语言接触并列,作为解释论元配置复杂性的重要维度。

5 余论

本文以施格与宾格的配置系统为讨论核心,提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人类语言在宏观上呈现由施格向宾格演化的统计趋势,但在演化过程中,宾格语言往往保留某些施格

① 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的一种语言,隶属于西尼罗特语族。

配置的痕迹;此外,某些宾格语言内部出现的施格性标记,也可能由语言接触与语义细化等机制促成。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提出的演化趋势属于类型学与统计意义上的宏观倾向,并不预设个别语言的具体历史轨迹。

本文将“施格→宾格”的方向性偏移与由接触/语义动因驱动的局部逆行统一起来,主张语言类型演化应理解为方向性演化与局部复杂性的互动过程。这一框架既能解释印地语等分裂施格语言以及巴斯克语等施格语言在以宾格为主的全球格局中的存续,也为理解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在大规模战争、人口迁徙与强烈语言接触的背景下,宾格语言可能出现对施格性标记的“借入”或“增强”;这一现象可类比汉语语序演化:总体呈OV→VO,但在特定语境中,由于语言接触或话题化等机制,保留了若干OV通格残留结构。印地语/乌尔都语在完成体环境中引入施格标记-ne,长期以来常被联系到与周边达罗毗荼语、伊朗语的接触;高加索语言中若干施格性标记的扩散,也常被视为区域语言联盟(Sprachbund)效应的体现。在此机制下,施格性往往表现为局部的、非核心的句法配置;当外部接触条件减弱,且系统内部缺乏进一步语义细化需求时,对施格性的标记可能逐渐退缩,回归宾格主导的模式。本文关于“语言接触”与“语义细化”在格配置演化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观点,与费尔凯克等(Verkerk et al., 2025)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的大规模统计研究在宏观演化图景上相容。

此外,本文将施格—宾格视为一个动态连续体,而非静态的类型对立。此一视角回应了国际语言类型学对“方向性变化与局部复杂性并存”的核心关注,也凸显了汉语材料在全球类型学讨论中的价值。通过对分裂施格现象的系统考察,可以将格系统的连续统解释与演化方向性结合起来,为解释汉语历史中的OV/VO并存现象、现代汉语中的非宾格与无标记被动结构提供统一框架。例如蒋绍愚(2023)所讨论的“无标记被动句”,本质上体现了P=S的类通格结构,如:

(64) 邯鄲圍(《战国策·赵策》)

(65) 屈原放逐(《史记·屈原列传》)

(66) 直木先伐(《庄子·山木》)

(67) 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苴弘脔,子胥靡(《庄子·胠篋》)

这些材料不仅展示了OV→VO的跨类型一致性,也说明汉语在世界格类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宾格语言为了更细致地区分施事的生命度、使因性、意志性、控制性以及事件完整性,在特定语境中可能引入施格标记。印地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的完成体中施格标记的出现,常被解释为功能性强化的结果,而非系统返祖。语序演化中,VO语言通过局部OV结构满足话题化需求或通过论元后置凸显焦点的现象,也可纳入同一机制之下。例如:

巴斯克语:

(68) Irakasleak esan du egia.

teacher-ERG say AUX truth. ABS

“The teacher has said the truth.”

(Euskaltzaindia, 2019:135)

通格出现在动词后。相同的现象还有格鲁吉亚语:

(69) მამამ წაიკითხა წიგნი.

mama-mc aik' itx-a cign-i

father-ERG read. AOR book-NOM/ABS

“Father read the book.”

(Hewitt, 1995: 428)

汉语中的通格结构如“王冕死了父亲”“台上坐着主席团”亦然。与“王冕父亲死了”“主席团坐在台上”相比,这类句式同样利用了句尾焦点机制,与施格语言中通过语序变化凸显焦点的策略具有共通性。

本研究聚焦于人类语言格系统的演化方向性与局部复杂性互动。尽管语言在宏观上呈现施格 → 宾格的统计趋势,但接触和语义驱动会在局部造成“逆行”,而这种逆行并不改变整体演化的方向性,而是语言系统在不同层面的动态平衡。我们亦不应将宾格语言中的施格性一概视为返祖现象,它可能是接触强化或功能性细化的产物。这一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何使用人口较多、接触程度较高的语言(如印地语、藏语、汉语)仍然保有不同程度施格性的现象。

致谢:本文部分内容曾在2025年9月“走向新描写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上作大会报告,得到与会专家胡建华、李行德、袁博平、张洪明等先生的指教,写作过程中得到山东财经大学于秀金和苏州工学院柳俊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郭锐,志村法穗. 2025. 格配置的类型学分析——制约格配置的语义、语用动因[J]. 语言学论丛(3):3-46
- 金立鑫. 2022. 地理分布、气候特征对语言结构模式的影响[J]. 南开语言学报(2):1-15.
- 蒋绍愚. 2023. 《左传》《庄子》的无标记被动[J]. 当代语言学(3):317-341.
- 陆丙甫. 2005.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J]. 当代语言学(1):1-14.
- 于秀金,赵雪. 2025. 论元配置模式及其分裂的类型学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5):35-66.
- Anderson, S. 1977. On the Status of Ergativity in Indo-Iranian[J]. *Language* (4): 759-778.
- Andersen, T. 1988. Ergativity in Pāri, a Western Nilotic OVS language[J]. *Lingua* (4): 289-324.
- Belyaev, O. 2010. Evolution of Case in Ossetic[J]. *Iran and Caucasus* (2):287-322.
- Bossong, G. 1985. *Differentielle Objektmarkierung in Den Neuiranischen Sprachen*[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Bowerman, M. 1974. *Learning to Talk: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Early Syntactic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innish* [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Bowerman, M. 1982. Evaluating Competing Linguistic Models with Language Acquisition Data: Implications of Developmental Errors with Causative Verbs[J]. *Quaderni di Semantica* (1): 5-66.

- Bricker, V. R. 1981. The Source of the Ergative Split in Yucatec Maya[J]. *Journal of Mayan Linguistics*(2): 83-127
- Chung, S. 1978. *Case Marking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Polynesian*. Austin[M].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Coghill, E.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Ergativity in Aramaic: Cycles of Alignment Chan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 1978. Ergativity[G]//W. P. Lehmann, *Syntactic Typology: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Langua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29-394.
- Comrie, B. 1981.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 Hoop, H. & B. Narasimhan. 2008. Ergative Case Marking in Hindi[G]//H. de Hoop & P. de Swart, *Differential Subject Marking*. Dordrecht: Springer, 63-78.
- DeLancey, S. 1981. An Interpretation of Split Ergativity and Related Patterns[J]. *Language* (3): 626-657.
- Diamond, J.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Dixon, R. M. W.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73.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G]//T. A. Sebeok.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Hague: Mouton, 609-654.
- Dixon, R. M. W. 1977. *A Grammar of Yidi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94. *Ergativ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Пирейко, Л. А. 1968.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эргативности в индо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M]. Moscow: Nauka.
- Durie, M. 1985. *A Grammar of Acehnese on the Basis of a Dialect of North Aceh*[M]. Dordrecht and Cinnaminson, NJ: Foris Publications.
- Euskaltzaindia. 2019. *Euskararen Hiztegi Historiko Etimologikoa*[M]. Bilbao: Euskaltzaindia.
- Gell-Mann, M. & M. Ruhlen. 2011.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Word Order[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08(42): 17290-17295.
- Givón, T.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reenberg, J.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G]//J. H. Greenberg.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Jügel, Thomas. 2009. Ergative Remnants in Sorani Kurdish? [J]. *Orientalia Suecana* (LVIII) : 142-158.
- Haig, G. 2008. *Alignment Change in Iranian Language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witt, G. 1995. *Georgian: A Structural Reference Grammar*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ahn, L. & R. -L. Valijärvi. 2022. *West Greenlandic: An Essential Grammar*[M]. New York: Routledge.
- Kemmer, S. 1993. *The Middle Voice*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eyser, S. J. & T. Roeper. 1984.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J]. *Linguistic Inquiry*(3): 381-416.
- Lahaussais, A. 2003. Ergativity in Thulung Rai: A Shift in the Position of Pronominal Split [G]//D. Bradley, R. LaPolla, B. Michailovsky & G. Thurgood,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Pacific Linguistics.
- Law, D. , J. S. Robertson & S. D. Houston. 2006. Split Ergativ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olan Branch of the Mayan Language Famil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4): 415-450.
- Massam, D. 2002. Fully Internal Case: Surface Ergativity can be Profound [G]//A. Rackowski & N. Richards. *Proceedings of AFLA 8: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4). Cambridge, MA: 185-196.
- McGregor, R. S. 1972. *Outline of Hindi Grammar*[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hanan, T. 1994. *Argument Structure in Hindi*[M].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 Nichols, J. 1992.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Space and Tim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onan, M. 2005. The Nepali Language [G]//G. Cardona & D. Jain.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546-594.
- Otsuka, Y. 2001. Syntactic Ergativity and the Nature of Pronouns in Tongan[G]//A. Rackowski & N. Richards, *Proceedings of AFLA 8: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4). Cambridge, MA: 197-210.
- Perlmutter, D. M.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J].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4):157-189.
- Progovac, L. 2015. *Evolutionary Syntax*[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ndharipande, R. V. 2010. *Marathi*[M]. London: Routledge.
- Seiter, W. J. 1980. *Studies in Niuean Syntax*[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Sorace, A. 2000. Gradients in Auxiliary Selection with Intransitive Verbs [J]. *Language* (4):859-890
- Sorace, A. 2011. Gradience in Split Intransitivity: The End of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J]. *Archivio Glottologico Italiano* (1): 67-86.
- Stokhof, W. A. L. 1988. A Modern Grammar of Acehnese: Some Critical Observations[J].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outheast Asia*(2): 323-350.
- Sturua, N. 1985. Concerning the Category of Definiteness-indefiniteness in Basque[J]. *Euskera*(1):151-155.
- Thackston, W. M. 2006. *Kurmanji Kurdish: A Reference Grammar with Selected Reading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Vaillant, A. 1936. L'ergatif Indo-européen[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37): 93-108.
- Verkerk, A., O. Shcherbakova, H. J. Haynie et al. 2025. Enduring Constraints on Grammar Revealed by Bayesian Spatiophylogenetic Analyses[J/OL]. *Nat Hum Behav.*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5-02325-z>.

Ergative and Accusative Alignments and Their Evolutionary Dynamics

JIN Lixin

Abstract: Ergative and accusative alignments constitute two major configurational systems widely attested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pposition,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have long been a central concern in linguistic research. Adopting the basic hypothesis that human languages exhibit an overall evolutionary tendency from ergative toward accusative alignment—parallel to the well-established shift from SOV to SVO word order—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core factors that drive and shape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argument alignment: evolutionary residue, language contact and semantic refinement. Specifically, the study first argues that constructions such as unaccusatives and middles represent historical remnants of an earlier absolutive alignment. It then analyzes how large-scale language contact may accelerate or restructure ergative-accusative configurational pattern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refinement, the paper examines how ergative marking and split ergativity are motivated by semantic categories such as causativity, volitionality, and perfectivity, thereby enabling a more fine-grain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agents and patients. The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is study not only accounts for the persistence of split-ergative languages such as Hindi and ergative languages such as Basque, but also provides a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ixed alignment systems, including those observed in Chinese.

Key words: Ergative; Accusative; Split erg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Evolution; Language contact; Semantic refinement

责任编辑:黄均